

# 中医形上之思 (一)

□ 李致重\*

(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)

关键词 中医学 形而上学 方法论

## 1 中医是形上之学

近百年来对于中医“我是谁”、“我从何处来”，学术界其说不一。除了学术的偏见外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羁绊不容低估。其实，中医与西医一样，各自都包含着科学、技术、经验三个方面的内容。而基础理论是各自的科学部分；技术与经验皆从属于各自的科学原理之下。因此研究中医科学、软科学，必须立足于中医基础理论，首先思考“我是谁”、“我从何处来”的问题。

第一，春秋秦汉之际，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，

而中国代表着东方文化的中心。那是一个高峰时期的文化，透发出鲜明的形上性特点。不论在社会、历史、哲学、逻辑思维、伦理道德、工艺技术、天文等方面，都达到了成熟的水平，尤其像中国的“诸子”、古希腊的“三哲”、印度的佛陀等，他们思想的光辉一直指引着人类，并为当今的人们所不得忘记。

人类文化中的任何一门科学，只要在其所研究的特定事物（即研究对象）的认识上，揭示了其运动、变化的因果关系，它就可以说取得了超时空的真理性。把春秋秦汉之际视为中国文明的起点，就等于把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裁去了一

半。那是对历史的不公和篡改，历史当然不会答应的。所以离开了科学的真理性，只靠“古”和“今”是不能作为评价科学的标杆的。

以欧洲文艺复兴为代表的第二个文化高峰的特质，透发出鲜明的形下性倾向。也许因为这一高峰给近代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，也许因为人们的潜意识中对进化论的误解，人们或者冷漠、远离了形上性文化，或者以为“今天的人注定比过去的人高明”……其实都是虚无飘渺的自以为是而已。对于有着历史深厚积淀的文化科学的评判，对于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两个高峰的正确审视，这些自以为是，当然不是科学的态度。

第二，在中医成熟的春秋秦汉时期，人们所面对、所关注的客观实在，与近代相比，有着倾向性的差别。从科学实践的角度来讲，这

\* 作者简介 李致重，男，主任医师，教授。曾任《中国医药学报》常务副主编；中国中医药学会学术部、期刊出版部主任，软科学研究学组主任；兼任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教授，中国传统医学研究会副理事长，全国中医编辑学会副秘书长，广东省中医院学术顾问，法国巴黎波比尼大学医学院名誉教授等。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；出版学术专著8部。

里说的客观实在即科学研究的对象。那时候,思想家、科学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,主要就是自然而然存在的种种事物运动、变化着的“形”或“象”。

春秋秦汉时期的哲学、科学结晶,主要是以事物的“形”或“象”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。

春秋秦汉时期,人类制造器具的能力还很低下。中国“诸子”、古希腊“三哲”、印度佛陀都不懂今天的物理学、化学,也没有见过高楼大厦、飞机火箭这一类形下性的“器”。所以,用形下性的道理来诠释亚里士多德的《形而上学》,就象用物理学、化学来说明中医的阴阳五行、经络藏象、病因病机一样的可笑。因为中医研究的对象是“人的生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”,即证候,所以在研究中医“我是谁”和为其做定义时,对研究对象异同的严谨审视,这一点丝毫不容粗心大意。

当代的人们在讲科学方法、研究成果、学术观点乃至学说、学派的时候,往往疏忽了它们与研究对象的关系。因为不同的研究对象,决定了不同学科的属性;不同的研究对象,必然要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;不同的学说、学派,必然与不同的对象、方法有关。这些关系被人们疏忽之后,于是在社会上便形成了对科学的含义和分类上普遍模糊。固执地用物理学、化学的方法来解读中医学的荒谬做法,就是这种疏忽所造成的。

第三,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的问世,是中医成熟的标志。而中医的成熟,正是人类文化

第一个高峰时期中国思想、文化催生的结果。

讨论中医学产生和成熟的源头,自然要追溯到中国的文、史、哲知识,尤其以哲学思想为主。这个源头上的天人相应观、整体系统观、动态平衡观,象、道、气和阴阳五行学说等,就是中医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论。也就是说,用上述源头上的观念、思想、方法来研究“人的生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”,便形成了中医的概念(范畴)体系。这里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相互关系上,讲一个学科形成的原理的。

人们常说:“中医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的瑰宝”。这“沃土”就是人们以往所讲的“国学”。从国学看中医,“我是谁”、“我从何处来”,一目了然。远离国学之根,不知身在何处。

《易经·系辞上第十二》说: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周振甫在《周易译注》的解释:形象以上的抽象道理叫做道,形象以下的具体东西叫做器。这里的“形象”是“自然而然的存在”在人的感官里的反映。向上追问形象之所以形成、发展、变化、衰亡的本体,抽象地称为道。与此形成对照,由“自然而然的存在”向下探索,以求得具体的,以人的技艺所制成的东西,则称之为器。所以,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”之说,是“人类在科学分类上最早、最准确至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”的名言。实际上,人类的事业不论有多少门

类,归根到底都是在“道”与“器”这两方面进行着探索。

人是天地万物之灵,人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生物。从整个人类医学而言,“人是形上、形下二重性的人”。这一概括既恰当、又准确。中医和西医,其实各自着重研究了人的“二重性”之中的一个层面。所以“中西医并重”不仅是必然的,更是必须的。西学东渐以来,人们总是倾注于形下而疏远于形上,使中医走了近一百年的弯路。如果把西医分析、还原的思路和方法称之为形下之思,那么,欲复兴中医,出路就在于形上之思。中医是以综合(系统)性方法,研究人的形上(“原形”)属性的医学科学体系。中国的中医学者们应当懂得,本性上即属于形上性科学的中医,如果疏远了形上学,疏远了形上之思,是没有其他什么路可走的!

## 2 中西医方法论的差异

方法论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方式和方法的学问。它是前人认识客观事物的理论结晶,是后人认识客观事物的理论依据与方法源泉。科学实践表明,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随着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而发展的。而对于不同方法或方法论的选择,是以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来决定的。换一句话说,一定的研究对象,选择了一定的研究方法。

### 2.1 关于方法论的分类

关于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论,大体可以从纵向和横向将其分为两大类。

首先,按照不同的概括层次和隶属关系,从纵向来说,方法论大

体划分为三个层次。其一,适应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,其概括层次最高的方法论,为哲学方法论。其二,适应于社会、思维的一部分自然科学,较哲学方法论为之具体的一般科学方法论,比如以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为代表的,为系统科学方法论。其三,适应于专门学科的特殊方法,即具体科学方法论,如物理学、化学、数学方法等。

本人以为,在哲学方法论之上,还应再增加形上学方法论。“因为形上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,学问之巩固性、普遍有效性、合理性及确实性,全基于形上学。”<sup>[1]</sup>而亚里斯多德的《形而上学》的原名即《第一哲学》。所以也有的把形上学称之为“关于哲学的哲学”,足见形上学之重要了。

其次,如果把世界上的“万有”从“形”与“器”、“运动”与“物质”、“原形”与“原质”的角度去研究,那么从横向来讲,方法论大体可划分为两方面。其一,社会上的事、历史上的变、思维中的客观存在、自然界的事物运动等,它们都是以运动、变化着的形象(现代人称之为状态,系统科学称之为信息)呈现给人们的感官,然后通过人们的理性思维,以认识其内在的本质及其因果关系。这些运动、变化的形象、状态或信息等,都属于形上性的。所以需要人们运用形上学、哲学、系统科学方法论加以研究。除了社会科学、思维科学之外,自然科学中的天文、气象、生态环境、生物进化,生命科学中种种生命状态及其

运动、变化过程,都是形上学、哲学、系统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对象。其二,研究自然界的物质,研究制造供人衣、食、住、行方面的用器,则需要物理学、化学和数学等方法和方法论。这些研究对象都属于形下性的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当把动物或人当作机器,或者当作构成机器的物质材料时,动物或人的形上属性,则被掩埋掉了。就是说,把动物或人当做机器时,他们作为活的整体生命的属性,即消失了。活的整体属性消失了的人,是物理学、化学和数学方法研究的对象。所以,物理学、化学、数学方法,是研究形下性对象的方法,通常称之为还原性方法。

## 2.2 系统论形成于春秋至秦汉

十多年来,本人在中西医比较的研究中逐步认识到:东、西方古代的哲学、形上学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,所概括的许多基本观念和主要原理,有许多相通之处。这是人类共同的思想资源,至今仍有享用不尽的价值。

不过,东、西方古代哲学、形上学也有一定的差异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。

其一,由亚里斯多德《形而上学》所建立的、经托玛斯完善的学说,在解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时,对观念、原理的准确表述及其成功的逻辑思维体系,比同一时期中国“名家”的学说,要相对完整得多。

其二,由《书经·洪范》提出,经邹衍的深入研究,后经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发挥的阴阳五行学说,推动了中国在形上思维、哲

学思维基础上,率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科学方法。这是西方的形上学、哲学,不可与之相比的。

现在的人习惯认为,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相继出现的《控制论》、《信息论》、《一般系统理论》。其创始人是西方的维纳、申农、贝塔朗菲等。真正懂得阴阳五行实质的人,对这一观点是不能完全苟同的。其实,系统论(包括控制论、信息论)的真正的创始者是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哲们,而中国式的系统理论就是阴阳五行学说。20世纪80年代,国内许多从事系统理论研究的学者,透过《黄帝内经》已经模糊地感觉到了这一点。台湾学者邝芷人在1998年再版的《阴阳五行及其体系》一书中,经过反复论证,第一次明确提出:“从方法论方面说,阴阳五行思想并不是一种迷信,而是一种系统思维之形上构架。”他在与贝塔朗菲的“一般系统理论”比较之后作出结论说:“阴阳五行的原理在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中被视为一种一般系统理论。”作为“系统语言”和“信息语言”,“成为乐律、伦理、政治、医学、术数等之理论基础。”<sup>[2]</sup>

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成功运用,使之上升到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成熟阶段。中医的证候相当于生命过程中的变易着的信息;经络藏象和病因病机,以及在此基础上六经、卫气营血、三焦、脏腑经络、气血等临床辨证体系,相当于一般系统论中的信息系统模型;而临床中运用的种种治疗法则、方剂、药物等,则是控制论思想与方

法在医学科学中的成功运用。

可以说, 阴阳五行学说促进了中医的发展, 中医的发展完善了阴阳五行学说, 并使之成为用中文表述的、历史上最早的系统科学方法论。

### 2.3 还原论为西医方法论之本

从 16 世纪文艺复兴以来, 人们由以往重视原形的研究, 逐步走向了重视原质的研究。这一点, 当然是从形上学、哲学的观念来讲的。在自然科学领域里, 自然科学家们认为, 自然科学好象已经找到了宇宙本体的问题, 形上学和哲学已经为自然科学所代替, 没有再存在的必要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 在哲学上最为典型的例子是, “万物”、“万有”的观念从此受到冷漠, 连“事物”一词的内涵, 也在潜移默化中被“物质”的含义所代替。由此, 学术界陷入了一种空前的误解, “物质”被充当为世界上一切客观实在的总称。

近代西医学是在还原论的推动下, 沿着形下的方向迅速发展的。文艺复兴运动以来, 有的人主张用物理学知识来解释医学问题。比如, 波瑞利 (1608 ~ 1679 年) 在其《动物运动》一书中, 以数学和机械学原理说明动物的运动, 笛卡儿 (1596 ~ 1650 年) 在其《动物是机器》一书中, 以机械定律解释生命现象, 拉·美特里 (1709 ~ 1751 年) 在其《人是机器》一书中, 力图用牛顿力学的原理来解释人的生命现象。而有人主张用化学知识来解释医学问题。比如, 巴拉塞尔苏斯 (1409 ~ 1541 年) 是其早期的代表。哈尔蒙特 (1577 ~ 1643 年) 是

其奠基者, 他首先反对盖伦的体液病理学, 认为生理过程的本质是化学性的。杜布瓦 (1614 ~ 1672 年) 则认为, 人的健康全赖于酸性和碱性两种体液, 二者在人体内可以合成中性物质。也有人主张用生物学的知识来解释医学问题。比如, 微尔肖 (1821 ~ 1902 年) 在细胞学的基础上, 于 1858 年发展为细胞病理学, 认为医学上关于人的病理学, 就是细胞的病理学。科赫 (1843 ~ 1910 年) 在巴士德微生物学的基础上, 发展为病原微生物学。认为察明外来的病原微生物, 就是在病理学上的最终解释。因而, 到了 20 世纪, 西医学在生物物理学、生物化学、分子生物学等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, 并在此同时出现了多种突破性的新技术。所有这一切, 都是以文艺复兴以来的还原论为基础上的。它也长期的、深深的影响着西医生物医学的方向。

20 世纪后半叶, 还原论把“器的时代”一步步地推向了极致。而这个时候, 也恰恰因为这种器的时代的还原论, 把西医的生物医学逼到了尽头, 使其碰到了难题。表面上看, 是因为化学合成药物的临床疗效差, 毒、副作用大。而本质上看, 则是生物医学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。所谓“尽头”的问题, 其实是生物医学自身的结构性问题。比如, 现代生物医学的研究, 越来越逼向了构成人的原质, 越来越走向了形下, 所以也就越来越远离了整体的、原形的人, 远离了活着的形上的人。再如, 把化学药物对细胞、分子的效果, 视为药物对人的效果; 把针对细胞、

分子的药物而在人身整体上造成的毒、副作用, 回过头交给病人来承受。这里举出的两个问题, 就是医学理论结构上的大问题。对于这样的医学观念和理论, 不作认真的反思怎么能行呢? 《黄帝内经》上说: “人以天地之气生, 四时之法成。”亚里斯多德说: “原形是现实”, “原形限制原质”; 原质是“纯潜能”, 不与原形在一起就无法独立存在。那么, 生物医学怎么能脱离天地自然的规律, 怎么能脱离人的本性, 怎么能置“形质论”里的基本原理于不顾呢?

在西方, 看到了生物医学的局艰性, 并且为其指出了新出路的, 是美国的生物学家恩格尔。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了“生物—心理—社会”综合性医学新模式, 博得了现代医学界的广泛认同。其实恩格尔的思维是可喜的, 但不彻底。当恩格尔“三为一体”的新医学模式传到困惑中的中医们耳里之后, 我们却从中得到了另一种启示: 人类医学需要研究形下的人, 更需要研究形上的人; 需要还原性方法论, 也需要系统性方法论; 需要西医, 当然也更需要中医。

不管这些启示在当今有多少人理解和认同, 但是我们深信, 无论如何它已经在逐步改变着中医在中国境内长期、被动的局面了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 W. C. 丹皮尔 (英) (李珣翻译).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. 1988.
- [2] 邱芷人. 阴阳五行及其体系 (增订版) [M]. 台北: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. 1998.